

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

主编/侯忠义 安平秋

晚清小说简史

欧阳健/著

古代
小说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

主编/侯忠义 安平秋

晚清小说简史

欧阳健/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小说简史 / 欧阳健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(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/侯忠义,安平秋主编)

ISBN 7-203-05268-0

I. 晚... II. 欧... III. 小说史—中国—清后期
IV. I207.4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6684 号

晚清小说简史(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)

著 者: 欧阳健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: 阎卫斌 薛飞飞

承 印 者: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 山西人民出版社

人民印刷分公司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邮 编: 030012

印 张: 37.625

电 话: 0351-4922220(发行中心)

字 数: 970 千字

0351-4922208(综合办)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E-mail: Fxxz@sxskcb.com (发行中心)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Web@sxskcb.com (信息室)

印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Renmshb@sxskcb.com (综合办)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定 价: 80.00 元(全套)(每本 16 元)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主编

侯忠义 安平秋

编委

[以姓氏笔画为序]

张俊 欧阳健 崔元和 曹亦冰 萧相恺



一	晚清新小说的生成	[1]
二	新小说的发轫 (1902—1903)	[14]
	(一) 新小说的开山之作《新中 国未来记》	[14]
	(二) 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 小说	[25]
	(三) 从最贴近距离写庚子国变 的《镜中影》	[40]
	(四) 新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	[48]
三	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(1903—1905)	[58]
	(一) 《文明小史》: 西方文明的 引进与反弹	[58]
	(二) 《官场现形记》: 改革背景 下对官僚体制的谛察	[73]
	(三) 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: 改革眼光对社会现实的全 方位扫描	[95]
	(四) 《老残游记》: 爱国志士对 于改革维新的深层思考	[107]
	(五) 《孽海花》: 一代名士从晦 蒙否塞到开眼看世界的心 路历程	[122]
	(六) 《痴人说梦记》: 以正面理 想人物为中心的长篇小说	[138]
	(七) 《市声》: 民族资产阶级初 登历史舞台的心声	[149]

(八)《新石头记》：传统文化对
现代文明的介入和超越
..... [161]

(九)《洪秀全演义》：讨伐“满
洲伪业”的民族英雄的颂
歌..... [173]

四 新小说的第二个高峰(1906—1909)
..... [182]

(一)立宪小说：改革的深化及
其面临危机的纪录..... [182]

(二)《新三国》：政治体制改革
方案的抉择和预见..... [188]

(三)《新水浒》：社会经济改革
的超前描摹..... [200]

(四)《宦海潮》、《宦海升沉录》：
革命清议的《春秋》和
《纲鉴》..... [208]

五 新小说的馀波(1910—1911)
..... [222]

从《新中国》到《血泪黄花》：
改革终结的历史见证..... [222]

主要参考书目..... [236]

一 晚清新小说的生成

(一)

著名学者阿英说：“晚清小说，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。”（《晚清小说史》第1页，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一版）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著录1901年至1911年白话小说529部，几乎占自唐代至清末总量1164部的一半，证明这一判断是准确的。导致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是什么？阿英概括为以下三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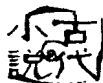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，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，尤其是石印和铅印技术的引进，没有以前那样刻书难的问题，加上新闻事业的发达，报刊需要广载小说，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；

第二，是由于当时智识阶级受西洋文化的影响，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，创作热情空前高涨；

第三，是由于清室屡挫于外敌，政治上又极腐败，大众知道政府不足于有为，遂写作小说，以事抨击，并提倡维新与革命。

这一问题，关系到晚清小说实质与价值的判断，故需多问几个为什么。以第一个原因来说，印刷术固然是出版的物质基础，但不构成晚清小说繁荣的直接原因。如石印自光绪二年（1876）开始采用，确实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。英人美查在上海设点石斋，石印《康熙字典》十万部；广东人徐鸿复等先后开设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，石印《二十四史》等。按说，更易获利的小说亦应大量刊印；然而，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五年（1875—1899），共出版小说79部，每年平均3部。可见印刷术的发达，与小说的繁荣并无必然联系。

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晚清小说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



青睐。他们强调，晚清的第一媒体是报刊，它使小说的生产过程与发表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。晚清小说理论的创导者利用报刊宣传小说、抬高小说的地位，赋予其革新政治的使命。有理论的支持，有大量的作者群，有连续快速的载体，晚清小说便蓬勃发展起来。

应该承认，晚清报刊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变迁中，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但不能将报刊看作晚清小说发展繁荣的基本动力。首先，报刊的兴盛不是孤立的，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古代虽然有“邸报”、“京报”，那并不是现代的新闻事业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第一份中文报刊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》，不出版于中国而出版于马六甲，表明其时中国还没有起码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，也没有容纳报刊的社会制度。鸦片战争后，在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开始在内地出现，如宁波 1854 年的《中外新报》、上海 1857 年的《六合丛谈》、1861 年的《上海新报》、1872 年的《申报》等。中国人自办的报纸，最早有汉口 1873 年的《昭文新报》和上海 1874 年的《汇报》、香港的《循环日报》等。而报刊的大量创刊和广泛发行，尚有待于官方控制的放松与社会机制的变化。其次，传媒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，是要由具体的人来承办的；报刊的宗旨是什么，它要传播什么信息，同样是要由具体的人来决定的。从根本上讲，仍然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与时势的转移。早期报刊的内容多是社会新闻与商业新闻，并不涉及敏感的政治。从 1872 年起，《瀛寰琐记》、《侯鯖新录》、《海上奇书》等文学性刊物先后创刊，所载的多是文言小说，并没有新的时代气息。刊登有时代特征的小说作品的白话报刊，如《杭州白话报》、《中国白话报》、《演义白话报》、《安徽俗话报》、《苏州白话报》等，是二十世纪初应时而生的。其宗旨是宣传维新与革命，构成传播活动的主旋律。从 1902 年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以后，晚清专门小说报刊遂风起云涌，正如黄摩西《小说林发刊词》所说：“今之时代，文明交通之时代也，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？”“小说交通之

时代”的产生，是不能从小说自身或媒体自身寻找原因的。

再说第二个原因。中国的知识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若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，到十九世纪末已度过了漫长的60年。随着西学的输入，思想界学术界开始发生变化，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也有不同程度的变革；但在小说创作领域内，却闻不到一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气息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至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的35年中，只创作出版了54部小说，且全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绣球缘》，神怪小说《升仙传》、《鬼神传》，历史小说《群英杰》、《铁冠图》，公案小说《小五义》、《彭公案》之类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，和古小说都没有质的不同。由此可见，小说的发展变化自有其特点和规律，并不必定与历史发展变化完全重合和同步。

第三个原因，“大众知道政府不足于有为，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”云云，实源于鲁迅：“光绪庚子（1900年）后，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。盖嘉庆以来，虽屡平内乱（白莲教，太平天国，捻，回），亦屡挫于外敌（英，法，日本），细民暗昧，尚啜茗听平逆武功，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，凭敌愆之气，呼维新与爱国，而于‘富强’尤致意焉。戊戌变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，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，顿有抨击之意矣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鲁迅把眼光投向庚子（1900）以后，以为小说创作至此而“特盛”，是很有见地的。但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，并没有熄灭“有识者”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，相反，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，也酿就了晚清小说的繁荣。种种事实提示我们：1901年一定有重大历史事变发生，它推动了报刊的发展，左右了作家的心灵，进而影响了小说自身的演进轨迹。

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廷1901年开始的改革。正是这场改革，给小说的繁荣带来了生机。

清廷的改革决心，是以“巨额之代价”换来的。梁启超1901年说：“庚子八月，十国联兵，以群虎而搏一羊，未五

旬而举万乘，乘輿播荡，神京陆沉，天坛为刍牧之场，曹署充屯营之帐，中国数千年来，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。”（《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，《清议报全编》第一册）庚子国变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，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，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、豆粥难求的苦难，以巨额代价，增一层见识：“时经大创后，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，知此后行政之方针，不能不从事于改革，以图补救，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，布告中外。”（黄鸿寿：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九）这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（1901年1月29日）在西安发布的谕旨，其中说：“自播迁以来，皇太后宵旰焦劳，朕尤痛自刻责。深念近数十年来，积弊相仍，因循粉饰，以致酿成大衅。现正议和，一切政事，尤须切实整顿，以期渐致富强。懿训以为：取外国之长，乃可去中国之短；惩前事之失，乃可作后事之师。”（《光绪朝东华录》总4601页）谕旨猛烈抨击“祖宗成法”，号召效行西法，“严祛新旧之名，浑融中外之迹”，且对仅学其“语言文字制造机械”等皮毛进行批评，提出“法积则敝，法敝则更，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”的方针，要求“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，各就现在情弊，参酌中西政治，举凡朝章国政、吏治民生、学校科举、军制财政，当因当革，当省当并，如何而国势始兴，如何而人才始盛，如何而度支始裕，如何而武备始精，各举所知，各抒所见，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，再行上禀慈谟，斟酌尽善，切实施行”，显得颇有生气。

这道谕旨的颁布，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。从此，清廷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，其内容包括废除科举、创办学堂、奖励留学、扩展新军、兴建铁路、发展实业、改革法制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等，涉及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军事、法律等广阔领域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朝着现代化方向挺进。蒋廷黻《中国近代史》评价说：“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，这

时西太后都行了，而且超过了。”（第90页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）慈禧太后此举，自然是为了维护统治地位，但又确实实行了一场有内涵的改革，反映了时代之变，潮流之变，清廷施政方针不得不变的历史趋势；唯此之故，“振刷精神，力祛积弊”，“实事求是，共济时艰”，已成为当时谕旨和奏折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。

由煌煌上谕所确认的作为国策的改革，是以清王朝的权威性、合法性为前提的，即便是当年扼杀戊戌变法的顽固派，也不敢抗拒这种潮流。对广大民众来说，乱后思治，改革决策受到了普遍欢迎。梁启超1901年10月《维新图说》提到，其时维新之语，“弥漫磅礴于国中，无论为帝，为后，为吏，为士，为绅，为商”，均以维新为时尚，“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，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”，反映出社会的普遍心态。对于改革的前途，许多人是寄予厚望的。有一篇文章说：“中国维新之机，西太后挫之于北京，张之洞戕之于汉口，义和团阻之于直省，震旦新机宜其绝，中国国命宜其死矣，而维新之气焰不少减，反有挟浪乘风、披靡中原之势，是非所谓外形败而实胜耶？”（赵振：《说败》，《清议报》第八十七册，1901年）

正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，维新报刊方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热情宣传爱国救亡，鼓吹开明智、兴民权，呼吁发展教育，振兴实业，传播科学知识，反对迷信，抨击三从四德，提倡妇女解放，介绍西学，批评时政：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。况且改革的要旨是“取外国之长”以“去中国之短”、“惩前事之失”以“作后事之师”，且须“参酌中西政治”、“当因当革，当省当并”，“或取诸人，或求诸己”，“各举所知，各抒所见”，思想的禁锢（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，是极为严厉的）被打破了，作家敢于揭露时弊，议论朝政了；同时，改革自身的运作也使社会现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，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新颖的素材；作为感应的神经，改革小说



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。文学的自由局面，文学观念的全面更新，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。大众传媒的兴盛又建构了“国民意识”，制造了大众品味，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。

(二)

自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于1937年初版，“晚清小说”的概念便为多数学者所沿用，但其定义至今仍处于朦胧之中。那种将1840年作为开端，以便与所谓“近代”保持一致的做法，已为多数学者所摒弃。“晚清小说”其发端或定在1895年，或定在1897年，或定在1900年，或定在1902年，时间上的出入似乎并不大，关键乃在划分的标准。“晚清小说”不等于“晚清时期的小说”，萦绕着作者心灵牵引着读者情感的，多是与民主富强相关的理想，它在本质上是有别于传统小说的“新小说”，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“吾国长进之机”（《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》，《外交报》第九期，1902年5月2日）的形势下所交的一份爱国主义的答卷。作为中国小说崭新阶段的“晚清小说”的正式揭幕，要归功于梁启超倡导的“小说界革命”及他创办的《新小说》杂志。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别署饮冰室主人，广东新会人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举人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随康有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，先后任《中外纪闻》主笔、《时务报》总撰述，积极宣传维新变法。1897年9月，他在《蒙学报演义报合序》中说：“西国教科书最盛，而书以游戏、小说者尤夥，故日本之变法，赖俚歌与小说之力。盖以悦童子，以导愚氓，未有善于是者也。”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，梁启超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小说问题。1898年11月，创办《清议报》于横滨，中有《政治小说》一栏。《清议报》12月23日刊梁启超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引英名士某君“小说为国民之魂”之言，且谓：“彼美、英、德、法、奥、意、

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，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。”作为政治流亡者，梁启超对慈禧太后是深恶痛绝的，《戊戌政变记》针对因“内忧外患之急如此”，推测慈禧“或鉴于时局而悟改革之理”，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，说：“西后之心，只知有一身，只知有颐和园，只知有阉竖，而不知有国，不知有民；既不知有国，不知有民，而欲其为国为民图幸福，乌可得也！”然而，一旦看到国内新的改革形势，他的心境就起了明显的变化。他在1901年12月写道：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，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，短兵紧接，而新陈嬗代之时也。今年以来，伪维新之诏书屡降，科举竟废，捐例竟停，动力微蠹于上；俄人密约，士民集议，日本游学，簪篙纷来，动力萌蘖于下：故二十世纪之中国，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，此中消息，稍有识者所能参也。”（《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，《清议报全编》第一册）梁启超虽称清廷改革为“伪维新”，但并不曾减弱自己的关切之情。作于1902年10月的《敬告当道书》说：“某窃观一、二年来，诸君中仰首伸眉，言维新言改革者踵相接，吾不禁跃然以喜；乃日日延颈以企，拭目以俟，一一详考诸君所行维新之实际，吾不禁尽然以忧。”当慈禧太后似乎已经充当康梁变法的“遗嘱执行人”，将两三年前被她扼杀的维新改革一一从头实施的时候，梁启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：一方面，他对慈禧太后“下罪己之诏，布更始之谕”，宣布实行改革维新的决策，是欢迎的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当道者有可能将改革半途而废或堕为骗局的危险，严正提出：要改革就必须“以实不以文，以全不以偏，以决断不以优柔”，并警告说：“时势者，可顺而不可逆者也，苟其逆之，则愈激而愈横决耳；机会者，可先不可后者也，苟其后之，则噬脐而无及耳。”（《新民丛报》第十八期）假改革，必然激起更大的风潮，卒致身败名裂，国家危亡；而改革的关键与核心，在于废除专制政治，代之以民主立宪。

正因为如此，作为改革事业的“过来人”，梁启超对于国



内的改革新形势，不是简单地加以“响应”，为之鼓吹呐喊，而是怀着沉重的历史感和卓越的预见性，从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思索中，更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考察中，提出了“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我民”的“新民”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夫吾国言新法数千年而效不睹者，何也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。今草野忧国之士，往往独居深思，叹息想望曰：‘安得贤君相，庶拯我乎？’吾未知其所谓贤君相，必如何而始为及格。虽然，若以今日之民德、民智、民力，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。”（《新民说·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一期，1902年2月）本着“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”的认识，梁启超鼓吹办报为国民之向导，进行广泛的启蒙教育，而小说，则是他找到的“新民”的最好武器。

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（1902年11月14日），我国最早的小说期刊《新小说》在日本横滨创刊；梁启超撰写的发刊词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及他创作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“新小说”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都发表在创刊号上，标志着晚清新小说的正式降生。

《新民丛报》十四号（1902年8月18日）刊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〈新小说〉》，实为《新小说》之发刊词，其要点包括宗旨：“专在借小说家言，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，激励其爱国精神。”语言：“文言俗语参用；其俗语之中，官话与粤语参用；但其书既用某体者，则全部一律。”内容：图画、论说、历史小说、政治小说、哲理科学小说、军事小说、冒险小说、探侦小说、写情小说、语怪小说、札记体小说、传奇体小说（戏剧）、世界名人逸事、新乐府、粤讴及广东戏本等。《新小说》第一年第一号刊出“本社征文启”，云：“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，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，乃为有意者，乃为有益时局。又如《儒林外史》之例，描写现今社会情状，藉以警醒时流，矫正弊俗亦佳构也。”吴趼人的投稿，显然是“征文启”的作用。杂志至光绪三十一年

(1905) 终刊，共出 24 期，发表创作小说 8 部，雨尘子的《洪水祸》、岭南羽衣女士的《东欧女豪杰》、玉瑟斋主人的《回天绮谈》，及吴趼人的《痛史》第 1—27 回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 1—45 回、《九命奇冤》第 1—36 回，琐颐的《黄绣球》第 1—26 回。另有楚卿（狄平子）的《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》、松岑（金松岑）的《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》等论文，在晚清小说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对于刊物的订阅、发行，也都有一套可操作的办法，堪称成功的范例。

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是“小说界革命”的纲领性论著，开宗明义即云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”结尾则云：“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。”从此竖起了“新小说”的旗帜。“新民”、“教育国民”的目的，是为了“养成一国之人，使有可以为立宪国民之资格”；是为了唤起民众，以主人翁姿态投身于改革的伟业。自觉地肩负起“新民”重任的晚清小说，不仅与一切以“劝善惩恶”为主旨的传统小说划清了界限，也获得了与晚清诗歌完全不同的禀赋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诗坛上几乎没有一位纯粹的诗人。那些在文学史上受到称道的诗人，他们的主要身份多半是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，他们只是在正业之余，吟咏情性，发而为诗；诗人不是他们的职业，诗作也不代表他们的主要成就。小说家就完全不同了。写小说，主要是为了给人读的，是为了影响别人的。无意成诗人，有心为作家。“新民”的任务，既如此神圣而又迫切，小说被誉为“文学之最上乘”，由被轻视的“末技”而一跃为“文坛盟主”（老隳：《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地位》，《中外小说林》第一年第六期，1907 年），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小说创作，甚至成为职业的作



家。

(三)

“新小说”的旗帜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立刻获得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。继《新小说》杂志而起的，有1903年5月创刊的《绣像小说》。《编印〈绣像小说〉缘起》说：“欧美化民，多由小说；搏桑崛起，推波助澜。其从事于此者，率皆名公巨卿，魁儒硕彦。察天下之大势，洞人类之颐理，潜推往古，豫揣将来，然后抒一己之见，著而为书，以醒齐民之耳目。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，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，揆其立意，无一非裨国利民。支那建国最古，作者如林，然非怪谬荒诞之言，即记污秽邪淫之事；求其稍裨于国、稍利于民者，几几乎百不获一。夫今乐而忘倦，人情皆同，说书唱歌，感化尤易。本馆有鉴于此，于是纠合同志，首辑此编。远摭泰西之良规，近挹海东之余韵，或手著，或译本，随时甄录，月出两期，借思开化夫下愚，遑计贻讥于大雅。”《绣像小说》的宗旨是“醒齐民之耳目”、“开化夫下愚”，与“新民”、“教育国民”，是同一个意思；但它所刊载的小说，不像《新小说》那样从正面宣传改革与立宪，而着重于“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”和“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”：后一方面，写国家之危险，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，命意比较显豁；前一方面，对人群之积弊（包括政府与民间）而下砭，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。改革所要克服的，正是这种种的“积弊”，而诸如此类的“积弊”本身，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。“揭发伏藏，显其弊恶，而于时政，严加纠弹，或更扩充，并及风俗”，就是为了证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，并为改革扫荡障碍。这类揭露专制政体弊恶的小说，一时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，晚清的几大小说名著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都问世于1903年，恰是与改革的进程相伴而行的。

但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六月十四日的谕旨说：“方今时局艰难，百端待理。朝廷屡下明诏，力图变法，锐意振兴。数年以来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，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，未能洞达原委。似此因循敷衍，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？”改革的难以深入，迫使清廷的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清廷派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、戴鸿慈、端方五大臣“分赴东西洋各国，考求一切政治，以期择善而从”，改革因而进入了新阶段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七月，根据考察大臣的意见，宣布预备立宪。三十三年（1907）五月二十八日，发布“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”谕，强调：“此事既官民各有责任，即官民均应讲求，务使事事悉合宪法，以驯致富强，实有厚望。”立宪政体的宣布，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：1905年，“立宪之谣起，而士民想望，为之勃兴”（吾晋：《论改良政治自上自下之难易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二年第一期）；1906年，“海内人士，喁喁望治，惟恐宪政之不立，而引领以欢迎之”（觉民：《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二年第十二期）；1907年，“今政府预备立宪之诏颁矣，四民莫不庆祝，举国若狂”（娲石女氏：《吊国民庆祝满政府之立宪》，《汉帜》第二期）。这些出自不同倾向报刊所透露的信息，反映了立宪带给人民的振奋作用。而“此事既官民各有责任，即官民均应讲求”的政策，进一步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，彻底冲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，为新小说的进一步繁盛准备了心理条件。1906年创刊的《新世界小说社报》、《小说七日报》、《月月小说》，1907年创刊的《小说林》、《中外小说林》、《竞立社小说月报》，1908年创刊的《新小说丛》，1909年创刊的《扬子江小说报》、《十日小说》、《小说时报》，1910年创刊的《小说月报》，汇成了晚清新小说百花争艳的苑地。这些风靡全国的小说刊物，以及大量刊印小说作品的广智书局、小说林社、新世界小说社、开明书店、改良小说社等，几乎多由倾向或赞成改革立宪的人士所主持，